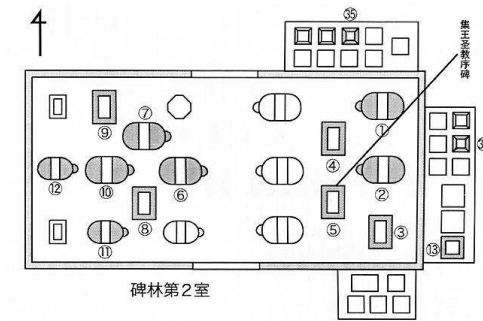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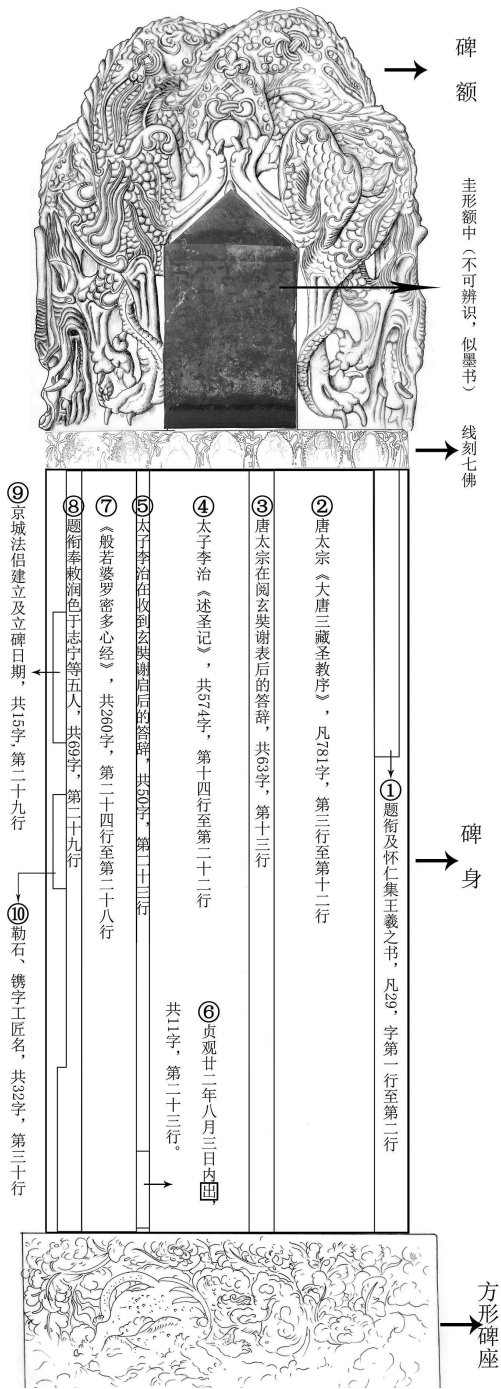


王字传统的构建与流行：关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的再讨论

罗丰

《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的存在,使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以往被人们忽略的地方。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探讨的内容既有碑石的构造形式,又有碑石流传过程,也有文本产生的背景,以及怀仁集字模式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是关于《集王圣教序碑》所代表的王字系统的确立。



▲ 图 2 碑林第二室

◀ 图 1 《集王圣教序碑》示意图

► 图 3 唐长安城复原示意图



来,制作出真正具有所谓“纪念性”的作品。《集王圣教序碑》在形式上既迎合了唐太宗崇尚王羲之书法的意愿,又满足当时社会流行佛教的时尚需求,是一举数得的举措。唐朝尚去王羲之时代不远,根据记载传为王羲之的书法墨迹虽然也有2000多纸之多,但毕竟观摹这些珍贵的书迹显然与普通民众无缘。《集王圣教序碑》问世以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原来碑刻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传播碑文内容,现在却有所不同,它第一次因为书法的原因而刻石,那就是所谓的“帖”了。《集王圣教序》的长度共有1904个字,许多字是《兰亭序》和其他王羲之著名作品所没有的,它为后世人们学习、了解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提供了大宗的重要材料。

不过,《集王圣教序碑》毕竟并非王羲之的亲笔书写,传播过程中所引起的歧义在所难免。一些人依此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媒介和楷模,世代相袭;另一些书家则以为是怀仁鸠集王字而成,还是怀仁自己写就这样基本的问题还没搞清。围绕着

《集王圣教序碑》,人们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对待《集王圣教序碑》的态度折射出的是人们背后所持有的书法理念和时代风尚。经典的地位就这样在不断的质疑声中构建确立。

《集王圣教序碑》的制作与流传

《集王圣教序碑》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陈列室(图2)。碑长方形,通高399厘米,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两侧有六条蟠龙,蜿蜒交织,龙首前肢环抱圭形额。圭形额面涂黑,似有一黑框,框中央有四行墨书篆字,大都不可辨认。碑上端刻有七佛,浅浮雕,半身佛像,七佛中只有第二和第六稍具眉目,其余面部不清。现在碑身断为两截,碑身文字,共有30行,用竖细线刻划界栏,完整的行大体保持在83-88字之间,其中以85、86字居多。也就是说虽是集书行书,但集书者对字数与碑面所容字数

精心规划,既不影响内容,又使碑面相对整洁、行气贯通。背面碑额部分与前一致,中央圭形额中亦平整无字,只是有类朱砂红色涂过。碑座长方形。

高僧玄奘经历千辛万苦西行求法,回程时就已受到唐太宗的高度关注。玄奘到达沙州(今甘肃敦煌)时就上表太宗报告行程。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沿事先规划好的路线从朱雀大街到弘福寺门数十里,百姓官员夹道相迎,送玄奘至弘福寺。

弘福寺位于长安贞安坊之西北隅(图3)。贞安坊神龙元年(705)改为修德坊。坊内最有名的建筑就是弘福寺,其原本是左领军大将军、彭国公王君廓宅邸,后获罪充公。《弘福寺智首碑》的出土大体上表明弘福寺大约在丰禾路与劳动北路交界东北隅。宿白将唐代长安佛寺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第四等十六分之一坊左右。弘福寺、千福寺均由私宅扩建而成,面积不可能太大,属第四个等级。

(下转4版) ➡

◀ (上接2版)

(processional liturgies) 有密切关系。各种圣像的安置往往是为了给参加这种仪轨的巡礼者以特殊的体验,这个过程,也就是 *Dustus*, 本身具有极强的表演性,满足这种表扬性极强的游行仪轨恰恰是中古教堂建造者的首要目的。(参见 Paul Crossley, “Ductus and memoria

Chartres Cathedral and the workings of rhetoric,” 收入 Mary Carruthers 所编 *Rhetoric Beyond Words Delight and Persuasion in the Arts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4-249 页)

“文本性”与“物质性”的存在和变化,都是历史境况的产物,因此和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的意识变化有直接关系。唐雯在《女皇的

纠结——《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及其政治内涵重探》一文里,通过对《升仙太子碑》的制作过程、碑上相关人名出现的位置等等细节的推究,以及王子晋故事在唐代政治文化系统中符号意义的变化的观察,巧妙地推论《升仙太子碑》的文本意义是如何随着武则天个人感触的变化而不断上升的过程。

以上是从中古中国的研究出发,对历史资料中存在的“文本性”与“物质性”的问题作扼要的讨论,希望这一议题能引起学界更多的重视。就实践层面而言,这一议题涉及的很多方面其实已经广泛出现在当下中古中国的研究中,但缺乏清晰的概念和成熟的思考框架会导致对中古历史遗存的性质和作用的肤浅解读,也会阻

碍重要问题的发现。相应的探讨在中古中国以外的领域更是常见,比如中国早期文本和佛教写本等方面的研究,更不用说在诸如欧洲中古史等领域。我相信,中古中国的研究若能在此方面加以开拓,不仅能够更好地进入中古社会的认知世界,也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对历史研究做出贡献。(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